

Lt. Gen. Guo Huaruo and the Security Works in Shanghai's Early Days after Liberation

郭化若与解放初期上海的警备工作

★ 丁 芮

摘要：解放初期，郭化若有6年的时间在上海负责警备工作。在上海期间，郭化若领导警备部队严打匪特，加强空中安全，维护城市秩序，并探索出一套在城市环境下部队进行生产、建设和密切军民关系的方法，完成了警备大上海的艰巨任务，对解放初期上海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新生政权的巩固作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郭化若 解放初期 上海 警备

中图分类号：K271 E297.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83-(2020)03-0043-10

郭化若（1904—1995）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的高级将领、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①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著有《今译新编孙子兵法》《孙子兵法》《郭化若军事论文选集》《军事辩证法》《远谋自有深韬略》《孙子今译》《学习与回顾》等著作。目前学界对于郭化若的军事理论与军事思想有不少相关研究，但对郭化若“有着特殊的怀恋之情”^②的上海警备工作却少有专门研究。1949年5月到1955年3月，郭化若在上海相继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政委、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上海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华东军区公安部司令员等职。^③在此期间，郭化若不仅组织领导部队严打匪特，加强空中安全，维护城市秩序，还探索出了一套在城市环境下部队进行生产、建设，密切军民关系的方法，完成了上级赋予的警备大上海的艰巨任务，对解放初期上海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新生政权的巩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部署警备工作，建立领导机构

在淮海战役结束之际，中共总前委和第三野战军的领导人就已在考虑派哪支部队攻打上海，哪些部队担任上海解放后的警备工作等问题。1949年5月6日，三野前委在苏州召集第9兵团政治委员郭化若和第26军政治部主任李耀文等开会，专门研究上海解放后的警备问题。会上宣布，上海解放后，第9兵团兵团部兼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部领导机构。总前委开始考虑到大批部队进入上海市区容易发生住宿困难和违反政策纪律等问题，认为“只需经过训练的六个营进入市区，维持秩序”^④。但粟裕、张震经过周密计算后，5月13日向总前委和华东局报告称：“由此六个营担负，则兵力实不敷分配。”^⑤总前委根据平津经验也认为，“以足够部队入驻市区是必要的”，电告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应派驻相当大的部队”，后勤、辎重、行李、马匹、炮兵重武器均不入市区，入城部队入城之前，应进行驻城专门训练，“内容是如何保障居民民主利益，保护外侨，镇压特务破坏等”。总前委

【作者简介】丁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 参见宋任穷：《深切怀念郭化若同志》，《人民日报》1996年8月5日，第10版。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警备大上海》，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76页。

③ 参见郭化若纪念文集编委会编：《一代儒将：郭化若纪念文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738～741页。

④ 参见粟裕文选编辑组编：《粟裕文选》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29页。

⑤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警备大上海》，第227～228页。

专门指示宋时轮、郭化若，“不要等待，自己应初步考虑此问题”。^①

5月18日，总前委、华东局又致电第9兵团及入沪各军，提出分区警备与重点配备相结合的原则，明确规定警备部队的任务是“镇压反革命特务活动，肃清散（兵）游（勇）及残余敌人，维持秩序，保障社会治安”。并对各军队入城程序、各部驻地、入城纪律等做了详细的指示，强调“在旧警察未经改造前，不能完全依靠其维持治安。只能起配合作用，（上海警备工作）必须由警备部队完全负责”^②。

1949年5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后，贯彻“打到哪里，警备到哪里，保护到哪里”的指示精神，实行了边占领、边设岗的办法。5月26日，第三野战军与第9兵团的第20、第27、第30、第33军，并第8兵团的第26军，及特纵担任上海市区及吴淞要塞区并宝（山）、嘉（定）、川（沙）、南（汇）、奉（贤）、青（浦）、松（江）各县及金山卫的警备任务。这些部队统归第9兵团兼上海警备司令部宋时轮司令员、郭化若政委、覃健参谋长统一指挥。市区警备具体的部署组织统由宋、郭、覃决定。^③

接到警备上海的任务后，郭化若与宋时轮、覃健根据上海环境异常复杂的情况，制定了第9兵团淞沪警备计划，提出警备计划的任务为：肃清流散武装残敌，镇压反革命的特务活动，保障社会秩序与治安，看守一切敌伪财产与军政设施，保护民族工商业、文化公共事业和外国侨民。保卫人民民主利益。警卫各级党政机关人员之安全，维护军风纪律。

由于上海各区情况不同，宋、郭在布置警备力量上决定，除原则上按每一旧行政区各配置一个团的兵力外，采取分区警备与重点配备相结合，并照顾偏僻地区与接合部，力求减少警备工作中的死角。由于警备地的辽阔与社会环境的复杂，在警备手段上也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以求达到警备周密的目的。郭、宋对于进入上海后的警备纪律，尤为重视，制定了详细的规定，要求“一切干部和战杂人员均应进行入城训练，切实讨论华东局颁发的入城纪律十二条，及本部印发之军风纪暂行手册，并保证严格执行”^④。

上海解放后，第9兵团进入上海。1949年5月29日，淞沪警备司令部正式成立，宋时轮任司令员，郭化若任政委，^⑤开始“人民自己武装警卫上海”，并将上海划分为五个警备区。^⑥淞沪警备司令部成立后，“为便于警备工作之适时进行”，将该部及各警备区所辖地区、办公地址、办公电话在报纸上进行公告，有关于警备工作的一切事宜，民众可就近直接向各警备区接洽办理。^⑦

1949年7月底，第9兵团奉命解除对上海的警备任务，宋时轮司令员率领兵团机关和第20、第26、第27军，到上海郊区进行整训，准备接受新的使命。上海警备任务改由第33军和第34军第100师等部担任。9月10日，郭化若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以第9兵团留下的一部分干部和第33军军部重建了淞沪警备区领导机构。^⑧

二、打击匪特活动，稳定社会治安

刚刚解放的上海很不安定，淞沪警备司令部成立后，肃清残敌、匪特，让各界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保障上海治安“首要任务”^⑨。宋时轮、郭化若连续发布各种有关维持治安的布告，而“为了贯彻各种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解放城市》（上），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第378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警备大上海》，第231～234页。

③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警备大上海》，第231～234、235～237页。

④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警备大上海》，第239～244页。

⑤ 参见《淞沪警备部成立，宋时轮任司令员》，《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5月30日，第4版。

⑥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警备大上海》，第248页。

⑦ 参见《淞沪警备部公布各辖区及办公地点》，《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6月12日，第4版。

⑧ 参见沈效良：《郭化若传奇》，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6页。

⑨ 《肃清残余匪特》，《文汇报》1949年6月22日，第2版。

治安措施，必须坚决镇压首恶分子，坚决镇压抢劫罪犯”^①。

淞沪警备部队采取的警备形式是留少数预备队集中驻扎、准备机动使用，其余大都以连为单位，各按其警备目标，梅花形散开驻守。为保证城市安全，仅在市区就设置岗哨500余处，另有200余个流动哨组。社会情况比较复杂的棚户区和海边防地区，也重点派驻了军队。警备部队20余万人，声势浩大，岗哨林立，日夜巡逻，使上海人民逐渐增加安全感，对敌对势力起了巨大的震慑作用。^②

国民党军队匆忙败退时，留下大批散兵游勇，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淞沪警备司令部成立当日，郭化若就与宋时轮等商量，在大街小巷张贴布告，责令散兵游勇在6月20日前到各区指定地点报到。同时，由各部队召集驻地旧保甲长开会，要他们对不按期报到者进行检举揭发。20日夜，淞沪警备部队发动全市清查运动，捕获国民党残余官兵多名。为防止匪特分子潜伏市内，对于公共场所除旅馆外，旅客也须登记，“俾使意图捣乱治安者，无法隐匿”^③。到7月底，主动到收容所报到和被抓获的散兵游勇达1.5万余人，其中，将、校级军官就有400余人。这批散兵游勇被收容后，警备司令部对他们进行了集中看管，分不同情况作了妥善处理。这样，既挖掉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又增强了上海人民的安全感。^④

上海解放之初，宋时轮、郭化若为了打击敌人，保护人民，宣布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为反动组织，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局、保密局为法西斯组织，都应立即解散，公布了收缴非法武器和私设电台的办法。这些先礼后兵的办法，有力地分化了敌人，鼓舞了群众。同时，淞沪警备司令部严厉镇压了一批武装匪特，如国民党特务姚安涛、胡载之，以及自称“中共地下军耀宇部队”的匪徒冯玉铭等4人。^⑤

淞沪警备司令部将姚安涛等匪特枪决是“符合人民要求，保障人民利益的重大措施”，得到了市民的欢迎。有市民趁此呼吁：国民党匪特们，赶快改过自新，向人民政府登记，洗手不干坏事，作一个新社会的好人民，你们可以考虑的时间并不多了，如果怙恶不悛，姚安涛、胡载之的命运在等着你！^⑥军警在进行搜捕匪特过程中，得到了民众“热烈的协助，使搜捕工作进行顺利”。对于搜捕匪特的活动，“市民无不认为这是应该的行动，而表示热烈的拥护”^⑦。

郭化若针对当时敌特活动十分嚣张的情况，认为仅有“公开的警备”还不够，必须有“秘密的警备”相配合。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作为反特战线的中坚力量，全面负责对匪特的侦察破案、拘捕审讯。军法处由郭化若亲自领导，通过发动群众和侦缉工作，在两个月内，破获一批重大案件，使一批潜伏特务以及持枪抢劫、杀人越货、扰乱金融的重要罪犯受到应有的惩处。^⑧警备部队担负起对匪特由侦破到处理几个环节的任务，是其他大中城市所没有的。^⑨

1949年9月10日，郭化若担任淞沪警备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重新组建了淞沪警备领导机构，警备部队由20余万人减为7万人，5000处固定哨所减为1300余处。面对部队人员减少，任务繁重，军政要职兼于一身，工作更加繁忙的情况，郭化若始终抓紧主动打击敌人、积极保护人民这一中心工作。8月，郭化若主持召开了淞沪警备区党委扩大会，并作了《加强反特斗争的进攻力量》的报告，要求把城市警备、边防守卫与肃清残敌结合起来。这次会议后，增强了反特力量，军法处扩充了机构，增加了人员。从上到下组成了一支500余人的反特队伍。郭化若仍然亲自抓军法处的反特斗争，大案要案他必

① 《肃清匪特维持治安》，《人民日报》1949年6月19日，第1版。

② 参见《郭化若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57页。

③ 《肃清残余匪特，发动全市清查运动，迄昨晨止捕获多名》，《文汇报》1949年6月22日，第2版。

④ 参见《郭化若回忆录》，第259页。

⑤ 参见《警备部枪决匪特六名，姚安涛等阴谋活动终于伏法》，《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6月25日，第1版。

⑥ 《上海人民一致起来，协助政府肃清匪特，把姚安涛的同类斩草除根》，《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6月25日，第10版。

⑦ 参见《军警与人民协力下，匪特三百就擒，并搜出长短枪廿枝》，《文汇报》1949年6月30日，第1版。

⑧ 参见沈效良：《郭化若传奇》，第195页。

⑨ 参见周红妮：《中国共产党接管大中城市纪实》，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3页。

亲自过问。^①

在郭化若领导下，淞沪警备部队破获了一大批重要案件，包括鸿生轮船枪杀案、“长江纵队”案、伪造人民币案、“治安军”案、抢劫轮奸德侨案、“江苏省人民反共救国军川沙支队”案等。^②

为提高民众的警惕，坚决镇压并肃清武装匪特，淞沪警备部队抓捕、审核的匪特大案及时向民众公布，并利用时机进行宣传。如1949年12月29日枪决“长江纵队”的7名案犯时，在执法前举行巡游，并由广播车向市民宣布匪特危害人民的罪行，沿途围观的市民达数十万人。市民对武装匪特能予以“合理的制裁，莫不称快”^③。在逮捕匪徒李文达等人后，浦东奉贤县李文达家乡人民“额手称庆”，并群起写信给淞沪警备司令部控诉李的罪行，其中有一封23人具名的信中“坚决要求人民政府将该匪犯等处以极刑，以安人心，而靖地方”^④。

在郭化若领导下，肃清敌特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维护了上海的社会治安，保障了人民的安全。从1949年5月至1950年6月，淞沪警备部队军法处系统共破获50余种特务组织，侦破敌特案件及各类刑事案件3626起，捕获罪犯将近1.4万人。对于这些被捕获的罪犯，经过审理，除将其中59名罪大恶极者判处死刑外，大多数被判处有期徒刑，还有一些经教育后释放，少数有立功表现的给予奖励。根据上海市军管会的决定，上海市公安局组建完毕后，原由警备部队军法处分担的地方反特工作，从1950年7月1日起，交由上海市公安局统一负责。

淞沪警备部队的肃特工作，受到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赞扬。他认为，上海解放初期，由淞沪警备部队直接负责抓捕特务，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这其实也是肯定了在新解放的城市中，在公安机关初建机构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由警备部队参与反特斗争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一条成功的经验。^⑤

三、维持城市秩序，加强军民团结

“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入城纪律搞不好，入城政策要走弯路。”^⑥郭化若一向注意部队的纪律工作。入城之前，郭化若、宋时轮等九兵团的领导同志提出了“打得好”“进得好”“管得好”的口号，在积极做好军事准备工作的同时，重视抓政策纪律的学习和警备工作的组织。郭化若亲自给干部作报告，并组织部队反复学习“约法八章”“入城纪律十二条”“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等以及外交政策的有关规定。^⑦

正是着重抓了思想教育和政策纪律的学习，人民解放军的优良纪律获得了上海人民的普遍赞颂。1949年5月25日，部队进入市区，除了执行看管敌伪机关的少数部队外，其余的部队都在马路旁休息和露营，即使是军部、师部等指挥机关也没有例外。解放军的严明纪律和对待人民的和蔼态度，得到了市民们的赞叹与颂扬。^⑧

^① 参见沈效良：《郭化若传奇》，第196～197；常建忠：《毛泽东的军事高参郭化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1页。

^② 参见《镇压反革命活动！》，《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12月29日，第4版；《匪特伏法，市民称快》，《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12月30日，第4版；《伪造人民币是人民公敌！》，《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12月2日，第4版；《淞沪警备部队破获匪特武装》，《文汇报》1950年3月19日，第2版；《维护守法侨利益！》，《文汇报》1950年4月12日，第2版；《“江苏反共救国军”破获》，《文汇报》1950年4月27日，第2版；《接受伪组织匪特武装，王升三处死刑》，《文汇报》1950年6月7日，第2版。

^③ 《匪特伏法，市民称快》，《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12月30日，第4版。

^④ 《匪特首恶李文达等六名无恶不作判处死刑》，《文汇报》1950年12月1日，第3版。

^⑤ 参见《郭化若回忆录》，第263页。

^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合编：《上海战役》，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第331页。

^⑦ 参见郭化若纪念文集编委会编：《一代儒将：郭化若纪念文集》，第39～40页。

^⑧ 参见《我军严守城市纪律，上海市民交口称赞，淞沪警备司令部成立》，《人民日报》1949年5月31日，第1版。

1949年6月4日,警备司令部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全面部署上海的警备工作,郭化若作了题为《庆祝上海解放,加强警备工作》的报告。郭化若说,警备部队进入上海后,目前的任务是,加强警备工作,肃清残敌,建立人民民主的秩序,保卫新上海的建设。解放后的上海有新的情况,认识上海的新情况,要用新的方式方法进行新的斗争、新的工作。为了认识新上海的新情况,郭化若在报告中勉励同志们要多做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可以认识上海各方面的情况,上海的特点,上海发展的规律,就能很好地改造上海、建设上海,而不致对在上海工作产生畏难情绪。

在报告中,郭化若还讲了做好警备工作需要注意的很多具体问题。比如,如何处理好与旧政府人员的关系,与居民的关系,如何防止汽车肇事等。^①郭化若报告中提出的这些要求,“看来似乎过于琐细,有的甚至失之过严,但在当时部队刚从农村进入大城市的情况下,为了从一开始就让上海人民对我军留下良好的印象,以利于我党我军很快在上海站稳脚跟,却是十分必要的”^②。

在郭化若作报告的前一天,发生了震惊上海的“王国瑞军车肇祸案”。为了在群众中挽回影响,郭化若立即让记者就此事件经过及警备区处理决定写一篇新闻报道刊登在报纸上。同时,郭化若通令对全市警备人员进行教育、甄审,及加强司机驾车技术训练。^③6月15日,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向上海各界人民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感谢各界人民和警备部队的亲密合作,检查部队发生的几起汽车肇事给人民生命造成的损失,并请各界人士对警备工作及部队纪律经常提出积极改进的意见。^④在郭化若主持下,通过对王国瑞事件的处理和报纸的连续报道,不仅有效地减少了汽车肇事事故,还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解放军“仁义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密切了军民关系,促进了社会安定。

加强军民团结是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郭化若深谙此点,他提出:“只要我们军民间的团结更进一步加强,我们就不但能取得已取得的作战上胜利,而且也一定能取得将要取得的建设上的胜利”^⑤。

为了加强军民团结,作为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的郭化若通过讲座的形式向上海民众宣传党的政策、解放军的光辉事迹,如1949年7月7日为纪念卢沟桥事变,郭化若讲了“七论人民国防”^⑥。1949年8月16日,上海交大举办第四次“青年讲座”,郭化若以“人民解放军是怎样作战的?”为题讲述了解放军英勇作战的动人故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市进行了转播。^⑦1949年11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三大宪章空中讲座”,郭化若作了《军队、军事制度》的讲座。^⑧

郭化若还代表淞沪警备部队积极参加各种群众性活动,如上海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庆祝中国人民政协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海电力公司工会成立大会,庆祝上海解放三周年足球表演赛、游泳、篮球表演大会等。在这些群众性活动中,郭化若积极发挥作用,1953年华东足球比赛,郭化若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1953年全国足球比赛、青年足球锦标赛,郭化若担任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华东区第一届人

① 参见《郭化若文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68~271页。

② 《郭化若回忆录》,第256页

③ 参见《辍伤同济学生熊恭礼致死,军车司机王国瑞判处死刑,警备部拨巨额治丧费慰问学生家属,并严禁军车横冲直撞》,《文汇报》1949年6月6日,第4版。

④ 参见《王国瑞奉准减刑后,警备部发表公开信,答谢各界人民爱护之忱》,《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6月17日,第3版。

⑤ 《郭化若讲话》,《文汇报》1949年10月3日,第2版。

⑥ 《纪念七七·庆祝解放,青年讲座今起举办》,《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7月3日,第1版。

⑦ 参见《第四次“青年讲座”明天在交大举行,郭化若主讲:讲题是“人民解放军是怎样作战的?”》,《文汇报》1949年8月15日,第3版。

⑧ 参见《帮助听众学习三大宪章,人民电台举办空中讲座》,《文汇报》1949年11月24日,第3版。

民体育运动大会，郭化若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等。^①

郭化若还经常参加各种形式的军民联谊活动。1950年春节，文艺界春节劳军小组慰问警备部队高射炮指战员，郭化若代表警备部队讲话，他说：“今天这个会，表示着文艺工作者和战士这二支大军的团结，携手合作。”^② 1951年春节期间，淞沪警备司令部举行庆祝新年军学代表联谊茶话会，郭化若代表警备司令部接待了学生们。1954年春节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部队举行春节招待少年儿童演出，郭化若代表驻沪部队向教师祝贺新春。^③

淞沪警备部队警备上海后，上海人民在困难的情况下，开展了多样的拥军活动。郭化若代表警备部队向民众表达感谢：“我们警备部队只有用出色的保卫大上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动，来回报各界对我们的关怀。”^④

郭化若在上海期间，为维护城市秩序，参与或主持了多项重大集体活动。如，1949年9、10月间，他担任了上海市“国际和平斗争日”游行示威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庆祝中国人民政协会议成功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上海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庆祝中国人民政协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主席团成员等。每年“五一”“十一”两次大的游行活动，郭化若更是担负重任，参与游行示威的治安工作，并多次担任活动的总指挥。如，1950年、1951年国庆期间，为保证游行的顺利进行，保障人民的生命与国家财产安全，郭化若代表上海市军警联合部门签署布告，对阴谋破坏的行为，坚决执行镇压。^⑤

解放初期，冬季治安问题更为突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巩固社会治安，保护国家财产及人民安全，群策群力进行防特、防匪、防火等工作”，于1950年11月9日成立上海市人民冬防委员会，“负责筹划并领导全市人民冬防工作”。冬防期内，各区及各机关、企业、学校等均将在上海市人民冬防委员会统一领导下，设立冬防委员会。该会订立了禁令和奖惩条例。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毅为主任委员。作为淞沪警备司令的郭化若对冬防工作担负重要责任，不仅担任副主任委员，^⑥还代表冬防委

① 参见《欢庆开国，保卫和平，上海举行庆祝示威大会》，《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10月3日，第1版。《建设新上海的有力支柱》，《文汇报》1949年9月29日，第2版。《庆祝上海解放三周年，昨天盛大足球表演赛，陈市长号召进一步开展群众体育运动》，《文汇报》1952年5月29日，第1版。《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一周年，本市举行游泳及篮球表演大会》，《文汇报》1952年7月2日，第8版。《华东区足球比赛大会隆重开幕》，《文汇报》1953年2月7日，第1版。《全国足球比赛、青年足球锦标赛，大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文汇报》1953年2月21日，第8版。《进一步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华东区体育大会昨举行开幕典礼》，《文汇报》1953年9月7日，第1版。

② 《军文艺界劳军小组慰问高射炮战士，会上警备部战士们高呼口号：“我们有信心把匪机打下来！”》，《文汇报》1950年2月25日，第3版。

③ 《解放军驻上海部队举行春节招待少年儿童演出，并演出话剧“尤利希·伏契克”招待文教界代表》，《文汇报》1954年2月8日，第3版。

④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部等编：《从渤海到大上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44～245页。

⑤ 《上海人民保卫国际和平斗争日筹备会成立，十月二日左右举行游行示威》，《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9月19日，第1版；《保卫世界和平，庆祝政协成功》，《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10月1日，第3版；《大会主席团名单》，《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10月1日，第1版；《动员上海劳动人民克服困难，各界筹庆“五一”劳动节成立》，《文汇报》1950年4月13日，第2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本市成立筹备委员会》，《文汇报》1952年4月23日，第5版；《庆祝伟大的国庆节，华东暨上海各界成立筹备委员会》，《文汇报》1951年9月16日，第1版；《上海市人民政府邀请有关方面举行会议，确定本市庆祝今年国庆节的办法，成立庆祝国庆节筹备委员会主持筹备工作》，《文汇报》1954年9月24日，第7版；《本市军管会军警联合办事处布告，严密保护人民爱国活动坚决镇压阴谋破坏份子》，《文汇报》1950年9月30日，第3版；《保障“五一”示威游行安全，本市军管会特重申禁令，对胆敢乘机破坏的反革命分子将坚决予以镇压并以军法从事》，《文汇报》1951年4月30日，第4版。

⑥ 参见《镇压反革命活动保护人民安全，沪人民冬防委员会成立》，《文汇报》1950年11月9日，第3版；《防特防匪，巩固治安上海成立人民冬防委会》，《光明日报》1950年11月18日，第4版。

员会向市协商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冬防工作的情况。^①

郭化若通过参加这些群众性活动，熟悉了上海各方面的情况，而民众也通过这些群众性的活动接触了解淞沪警备部队，从而“了解到解放军与人民之间的亲密联系，而大大提高了对军民关系的认识”^②。经过警备部队的不懈努力，积极改进，郭化若认为，“解放军驻沪各部队在解放以后四年来，已和上海人民建立了亲密的关系”^③，这种关系的建立对维护城市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应对敌机袭击，保障空中安全

上海解放初期，国民党一面派飞机不断对上海进行轰炸破坏，一面在长江口外布雷，利用盘踞的岛屿对上海实行海上封锁。郭化若领导淞沪警备部队，积极投入了反轰炸、反封锁的斗争。

1949年6月21日第一次空袭后，淞沪警备部队6月23日下午试放空袭警报，查看全市各处应对情况。淞沪警备司令部防空处还在人民电台设防空讲座，播讲实用民间防空常识，以及民间防空歌诀等。1950年2月6日的大轰炸，市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极大损失。为有效开展反轰炸斗争，1950年2月11日上海成立防空治安委员会，郭化若担任主任委员兼总指挥，统一指挥全市的防空治安工作。郭化若还负责统一指挥全市上午消防、抢救、警戒、修理及善后等工作，并把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等十余个单位联合起来。^④

2月14日，郭化若颁布了防空治安委员会1号布告《防空时期交通管制暂行办法》，规定了空袭预备警报拉响时各交通岗及车辆、市民应注意的事项。同月19日，郭化若又签署了防空治安委员会2号布告，公布了使用空袭标识及指挥交通旗帜办法与人民防空须知等。为使市民辨别警报信号与工厂、船只、车站灯信号，该会责成各工厂、船只、车站不得使用防空信号同样的信号，以免混淆。同月28日，郭化若又对第2号公布进行补充，以便市民分辨空袭警报与紧急警报。1950年3月，淞沪警备司令部防空处为补救警报规划不清及人力施放不均现象，制成电开自动警报器并运用至全市。^⑤

在郭化若领导的防空治安委员会的号召下，上海各界积极响应，动员组织起来，从里弄内到里弄外，从团体内到团体外，通过各种方式展开反轰炸斗争，参加纠察队、自卫队、救护队，进行防空，防火，向里弄市民进行宣传。^⑥这些行动，增强了军民之间的团结，鼓舞了上海人民战胜空袭的信心。

为有效开展反轰炸斗争，1950年3月1日，上海防空司令部成立，郭化若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3月中旬，郭化若主持召开了空军与防空部队联席作战会议，决定对各防空作战部队实行统一指挥。同时，采取措施多方提高预警能力，扩大了情报收集能力。^⑦

① 参见《政府加强管制棉纱和大量供应煤斤后，纱价煤价波动渐告平息》，《文汇报》1950年11月18日，第3版。

② 《纪念“七七”庆祝解放，筹备会昨召开总结会议》，《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7月10日，第1版。

③ 《解放军华东军区驻上海部队与各区选出的人民代表进行春节联欢》，《光明日报》1954年2月5日，第2版。

④ 参见《昨日试放空袭警报》，《文汇报》1949年6月24日，第1版；《防空处假人民电台，播讲实用防空常识》，《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12月12日，第4版；《人民电台今日要目》，《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12月13日，第4版；《沪防空治安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1950年2月15日，第4版；《上海展开反轰炸斗争》，《文汇报》1950年2月12日，第1版；《沪各界积极防空，组成全市防空治安委会，各厂工人日夜轮流守护机器》，《人民日报》1950年2月13日，第1版。

⑤ 参见《防空治安指挥部布告交字第一号》，《文汇报》1950年2月14日，第1版。《防空治安委员会公布使用空袭标识及指挥交通旗帜办法与人民防空须知》，《文汇报》1950年2月22日，第2版。《警报信号》，《文汇报》1950年2月22日，第2版。《便利市民分辨警报信号紧急警报换用旗帜 防空治安委员会昨天发出公布令》，《文汇报》1950年3月1日，第2版。《警报改用电放昨晚试放圆满》，《文汇报》1950年3月31日，第2版。

⑥ 参见《反对殖民制度斗争日，沪学联发出号召愿全体同学走上革命工作岗位展开反轰炸斗争》，《文汇报》1950年2月23日，第1版；《加强联系展开学习社会青年会师，二十余团体昨天举行联欢并邀勇龙桂聂凤智演讲》，《文汇报》1950年3月6日，第3版。

⑦ 参见沈效良：《郭化若传奇》，第199～200页；张锦才主编：《留下曾经的足迹》，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23页。

苏联空军到达上海协助保卫空中安全时, 人民解放军增调 2 个高炮团到上海配合。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 建成了一个由飞机、高炮、雷达、探照灯相配合的比较严密的防空作战体系, 上海空中的安全开始有了保障。为了确保防空部队和防空设施的安全, 警备部队担负了机场、雷达、探照灯的警备任务。军法处系统的反特斗争, 也把做好苏联友人住处和机场、防空点的保卫工作, 放在突出的位置上。4 至 6 月, 破获的破坏活动有 338 起, 捕获敌特分子 848 名, 较好地保卫了防空部队和防空设施的安全。^①

1950 年 5 月 11 日夜, 国民党军轰炸机窜入上海市区被击落。上海市政府组织市民参观了敌机残骸, 极大地鼓舞了市民加强空中安全的信心。^②

苏联空军不仅协助上海保卫空中安全, 还帮助防空部队掌握现代化装备知识。防空部队的许多干部、战士, 被分配到同苏军业务对口的各类岗位上, 由苏军官兵一对一地帮, 手把手地教, 直到学会操作使用为止。掌握雷达操作技术比较难, 郭化若就派人到交通大学动员一批学生来参加实际斗争, 这些学生很快掌握了苏军传授的技术。郭化若还请苏联顾问给领导干部讲课, 他自己和大家一起坐在课堂上听讲。^③

上海防空司令部为补充防空力量, 招收青年学生进入上海防空学校学习。经过广泛宣传, 各校同学掀起了报名热潮, 截止到 1951 年 1 月份, 先后已有 3500 人踊跃报名。上海防空司令部为了热诚欢迎报考的同学, 在该部大礼堂举行招待会, 郭化若亲自出席, 并勉励同学们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 确定革命的人生观, 用新的眼光看待各种问题。^④

在郭化若领导的上海防空司令部努力下, 经过军民的共同配合, 上海的防空力量迅速成长, 两个月内, 先后击落敌机 6 架, 迫使国民党空军不得不考虑“攻势要暂停, 活动需减少”^⑤。

五、发扬光荣传统, 加强文化建设

解放军部队进入上海后, 必须努力学会管理城市, 适应城市生活规律, 处理城市中的各种问题, 同时, 思想上也要跟得上这种变化。但面对新环境, 部队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问题。郭化若深切地认识到, 要纠正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 维护好党和军队的声誉, “必须继续保持与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与吃苦在先享乐在后的革命精神”^⑥。同时, 改善警备部队过于艰苦的生活也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淞沪警备部队进城之初, 由于 6、7 月间上海物价不断上涨, 物质生活受到影响, 引起战士情绪的波动。警备部队领导对此特别注意, 提出“巩固部队”的问题, 除了从思想上加强领导外, 还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做基础。在国家还处于极端困难时, 怎么提高部队的待遇是一个问题。

作为警备司令员的郭化若提出了“大力开展生产运动, 并与厉行节约相结合”^⑦的办法。1949 年 8 月, 为减轻国家负担, 改善部队生活, 淞沪警备部队决定开展“生产节约运动”, 号召所属部队发扬光荣传统, 开荒生产, 节约开支, 支援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9 月, 警备部队召集师以上干部开会, 汇报生产节约工作, 成立了生产节约指导委员会, 要求每个伙食单位种 2 至 3 亩地, 并开展养猪、捕鱼、生豆芽、磨豆腐等

① 参见郭化若:《郭化若回忆录》,第 264~268 页。

② 参见《美制匪机十一日夜袭本市》,《文汇报》1950 年 5 月 14 日,第 1 版。

③ 参见沈效良:《郭化若传奇》,第 200~201 页。

④ 参见《军事干校本市招生委员会,招收青年参加防空学校》,《文汇报》1951 年 1 月 19 日,第 3 版;《欢迎各校参干同学,本市防空司令部举行招待会》,《文汇报》1950 年 12 月 31 日,第 4 版。

⑤ 孙维韬、温致强编著:《苏联三次援华征战纪实》,北京: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2006 年,第 180 页。

⑥ 张同乐主编:《20 世纪中国经世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345 页。

⑦ 张同乐主编:《20 世纪中国经世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第 347 页。

生产活动。^①

淞沪警备部队党委开展思想工作、消除顾虑，一段时间后，开荒生产在淞沪警备部队中逐渐形成了风气。1949年8月到10月，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获得显著的成绩，在不增加人民负担的条件下，大大改善了部队生活，逐步提高了生活水平。到1949年底，开垦荒地2700余亩，收获蔬菜60万斤。另外，还生产豆腐40万斤、豆芽20万斤，拾柴70万斤，喂猪2700余头。警备部队在生产劳动中取得的初步成绩证明，城市驻军不仅可以从事农副业生产，而且这种生产劳动，无论对外界的政治影响，还是对部队的巩固，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②

1950年1月末，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郭化若以委员身份汇报了淞沪警备部队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说：“部队的生活在物价波动的条件下，得到了初步的改善。”^③为保证正确执行生产政策，鼓舞部队持久的劳动热情，警备部队重视加强政治工作的领导，制订了生产立功条例。淞沪警备部队凡借用土地均订有合同。^④

开展生产运动一年多后，淞沪警备部队发动战士、群众开荒种地6981亩，收获粮食近700万斤，饲养鸡、鸭、鹅13万余只，喂猪6000余头，开办了运输业，全部队积累生产和节约盈余约10亿元^⑤。如果把各单位当时有的家畜、蔬菜、生产工具等折款计算，则共有公积金70亿元。全部队水电费、办公费、杂支费等节约的总数为54亿元。随着生产发展，收益增加，郭化若开始考虑如何进行收益分配。1951年3月，郭化若代表部队党委在警备部队供给会议作了《军队中财政经济工作的十大原则》的报告，对部队生产的目的、方针、原则、收益、分配等作了明确的规定。^⑥

“参加生产劳动是培养和提高阶级觉悟的好办法”^⑦，郭化若指出，“生产运动，不应单纯从改善生活增加了我们积蓄这种经济观点去理解，更重要的是应看到它打下了巩固部队的物质基础，影响了上海人民劳动生产的热情和克服困难的信心，指出了城市驻军改善生活办法等政治意义。”^⑧

在进驻上海之前，郭化若有很长时间的军事教育实践，一直非常重视军队教育问题。进驻上海后，基层干部、战士文化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淞沪警备部队对城市的认识与管理。尽快扫除文盲、开展文化学习活动成为淞沪警备部队亟需解决的另一个问题。郭化若认为，“新教育最根本的原则是教育训练和生产劳动相结合”^⑨。在开展生产运动过程中，警备部队利用当时比较安定的环境，加紧进行军事教育、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⑩把劳动生产与团结进步教育相结合，部队的警备、学习、生产情绪均很高涨，对巩固部队起了很大的作用。^⑪

1949年8月开始，警备部队普遍展开文化学习。淞沪警备部队在此时期以前，由于作战行军频繁，学习机会不多，一般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很低，有的连队甚至有90%以上的文盲。^⑫由于郭化若和淞沪警备部队各级党委的重视，环境又比较安定，所有连队都非常努力，掀起了一股学习的热潮，建立了

① 参见郭化若：《郭化若回忆录》，第270页。

② 参见郭化若：《郭化若回忆录》，第270～271页。

③ 《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发言》，《文汇报》1950年2月8日，第5版。

④ 《三野驻扎宁沪杭地区部队利用空隙时间完成春季生产，大力参加国家建设完成“军民河”等水利工程》，《人民日报》1950年5月24日，第2版。

⑤ 此处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旧人民币，其1万元约等于1955年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1元。

⑥ 参见张同乐主编：《20世纪中国经世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第347～348页。

⑦ 郭化若：《学习与回顾》，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51页。

⑧ 张同乐主编：《20世纪中国经世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第347页。

⑨ 郭化若：《学习与回顾》，第41页。

⑩ 参见《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发言》，《文汇报》1950年2月8日，第5版。

⑪ 参见《淞沪警备部队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劳动生产改善生活》，《人民日报》1950年1月22日，第2版。

⑫ 参见《淞沪警备部队若干连队文盲全部消灭》，《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日，第3版。

学习组织和制度，添设了大批帮助学习的用具，使部队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淞沪警备部的文化程度，据1949年8月的不完全统计：识字在500以下者占82.9%；识字500至800者占2.6%，识字800至1200者占3%，识字1200以上者占11.5%。到1950年7月间，程度大为提高：识字500以下者已降至32.8%；识字500至800者升至15.6%；识字800至1200者升至15.3%；识字1200以上者升至36.5%。到1950年9月，半数以上的战士已能写简单书信、墙报和阅读战士读物。^①

1949年5月进入上海以后，在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过程中，郭化若敏锐地认识到抓紧部队教育、提高部队军政素质和文化素质重要性，倡导组建了淞沪警备部队文化干部训练团。训练团以“培养革命的知识青年，作为人民军队中的文化教育干部”^②为目的。男女青年学生经过各项考试合格者可进入训练团。这些知识青年进入部队后，能提高各级机关、部队的指挥水平和文化素质。第一期文化干部训练团于1949年10月14日开学，郭化若出席并讲话欢迎训练团成员。1950年文化干部训练团与华东军区淞沪警备司令部教导团合编。1951年扩编为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干部学校，郭化若兼校长和政治委员。^③

郭化若还亲自主办干部集训班，请陈毅和上海市委其他领导讲课，他自己也多次给干部作报告。郭化若的讲课很受欢迎，既提高了广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认识能力，触动了思想，开阔了眼界，又提高了大家的文化水平，激发了学习文化的热情。郭化若还从了解学生、选编教材、研究教授方法等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军队文化干部教育的教授法”，以解决解放后部队干部教育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郭化若有军事教育的实践，又有军事教育的心得，1950年，他的专著《新教育的教学法》出版问世，引起了军队和地方教育界的普遍重视。^④在郭化若的重视下，淞沪警备部队文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为完成警备任务提供了有利条件。

1955年4月1日，郭化若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结束了长达6年的上海警备工作。^⑤在上海期间，郭化若与淞沪警备部队全体将士不懈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在剿匪肃特、城市治安、空中防卫、军队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不仅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还促进了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在工作过程中，淞沪警备部队和上海人民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因其艰苦奋斗和遵守纪律的优良品质而成为市民学习的榜样。^⑥民众通过淞沪警备部队认识了人民解放军，增强了对人民政府的信任。

[责任编辑：刘向东]

① 参见《部队热烈学习，文化水平大大提高》，《文汇报》1950年9月17日，第3版。

② 《淞沪警备部成立文化干部训练团招考知识青年千人》，《文汇报》1949年9月4日，第3版。

③ 参见《警备部文化时训团招考学员一千名》，《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9月4日，第3版；《上海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军事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278页；《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部文化干部训练团开学》，《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10月15日，第3版。

④ 参见郭化若纪念文集编委会编：《一代儒将：郭化若纪念文集》，第39页；沈效良：《郭化若传奇》，第202～203页；郭化若：《学习与回顾》，第60～75页；郭化若纪念文集编委会编：《一代儒将：郭化若纪念文集》，第24页。

⑤ 参见郭化若纪念文集编委会编：《一代儒将：郭化若纪念文集》，第741页。

⑥ 参见《解放军华东军区驻上海部队与各区选出的人民代表进行春节联欢》，《光明日报》1954年2月5日，第2版。